



中央党校复校后学员们在认真听课

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

重新教育干部

□ 谢煜桐

务和方针，以邓小平提出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开展了重新教育干部的艰巨工作。

通过教学来推动完成学员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让思想转弯，是一件艰苦的、细致的、专业性的工作，至少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教材，即党校拿什么来教育学员；二是教学方式，即党校用什么方式来开展教学；三是学习的风气如何，是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党校能否很好地完成使学员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在这一时期，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时间分界点，此前此后的党校教学工作又有不同的特点。

从复校到1978年底，由于全党思想认识还没有统一，也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教材，党校组织编辑了100万字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作为基本教材。在学习方法上坚持以读原著为主，自学为主。针对过去存在的重第二、三手材料而不重原著，重辅导而不重自学的情况，党校坚持“两个为主”，引导学员刻苦攻读原著，同时为了帮助学员读懂原著，联系实际做了一些必要的辅导。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学习风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中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个人档案袋），强调教学工作要引导学员对于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养成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习惯。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摆事实、讲道理，有说服力，从分析中得出结论。强调理论学习必须敢于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由于社会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党校的教学又是触及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的一项工作，这就决定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校认真学习讨论三中全会文件，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来。

在这一时期，中央党校确定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原则，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重新教育干部，着重在思想、理论、路线和重大政策上分清是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重新教育干部，为全党的拨乱反正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这一时期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段特殊的重要岁月。这一时期，就全党来说，为了顺利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对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思想进行了认真清理，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阐述。通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内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1977年3月，中央即决定中央党校复校。复校后，千头万绪，但是教学是重点，也是难点。党校按照党中央确定的任

开发红色文献 传承红色基因

□ 徐晓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文献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种重要的红色资源，将其整理好、开发好、利用好，既能有效保存珍贵的党史资料，又能有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充分发挥自身红色文献资源优势，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故事，将开发红色文献与弘扬沂蒙精神紧密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

文献溯源，探究红色文献来源故事

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始建于1949年10月，曾先后接收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南干干部学校、渤海日报社等机构的藏书，汇聚了不少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一批珍贵的红色文献。由于历史原因，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文献中的一大部分被挑拣出来，打包封存在仓库中，后来虽然历经数次馆舍搬迁，却最终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2020年3月31日，在接到中央党校图书和文化馆校图字〔2020〕2号文件《关于在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进行馆藏红色文献调查的通知》后，图书和文化馆立即组建了“民国文献整理暨红色文献开发”项目组，对馆藏民国文献进行全面整理，对其中的红色文献进行鉴别和统计。首先，对封存的405包馆藏老旧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从中找出民国文献1.5万册，使这批尘封的珍贵文献得以重现。其次，项目组将分散在流通库、剔旧库里的民国文献与新发现的这批民国文献进行整合汇总、分类编目、数据加工以及图片采集建档，编制了《馆藏民国文献总目》，共计10600余种，2.4万余

册。最后，对10600余种民国文献进行逐一甄别，按照红色文献标准，鉴定出红色文献3000余种，9000余册，编制成《馆藏红色文献总目》。

在全面摸清馆藏红色文献存量后，项目组对照目录和电子图片，以藏书章为线索，对这批红色文献进行溯源，并最终厘清了它们的来源，梳理出了这批红色文献的最早收藏机构和中间的流转脉络：这批红色文献最初分散在群众报社、大众报社、渤海图书馆、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华东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省抗战建国学院等在内的十几家机构，后来，随着这些机构不断重组、合并，最后汇聚到山东分局南干干部学校、渤海日报社、山东行政学院、山东政治学校、山东省总工会干部学校这5家单位。1950年1月至1959年10月，这5家机构先后撤销或与山东省委党校合并，其所藏的红色文献最终全部汇聚到了党校图书馆。

在这5家机构中，渤海日报社收藏的红色文献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也最具代表性。渤海日报社是中共渤海区党委的机关报社，位于今天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1944年在渤海区群众报社的基础上建立。渤海日报社除了编印发行《渤海日报》以外，还负责渤海区部分图书的出版和印刷工作，编印出版了《评国内战局》《国际舆论》《反克里空：党报通讯员读物》等红色书籍。鉴于报纸、图书的编辑出版需要，渤海日报社参考室（资料室）购入了大量的红色报纸和图书，并接收了不少出版社的赠书。后来，渤海图书馆的部分图书也归入渤海日报社，其藏书种类和数量更加丰富。1950年4月，渤海区撤销，《渤海日报》停刊，渤海日报社的全部图书资料，从惠民经小清河运至济南，移交给了山东省委党校。

精品展示，讲好红色文献出版故事

2020年10月，图书和文化馆精选200种红色文献精品，编印成《馆藏红色文献精品图录》，对每种图书的著者、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号、开本等进行详细介绍。同时，举办馆藏红色文献精品展，通过陈列实物，向读者直观展示战争年代，在硝烟战火条件下，我党进行图书出版的艰辛。

在馆藏红色文献中，有一批山东革命根据地编印的口袋书，最能代表当时的时代特色。这批口袋书，出版时间在1940年到1949年之间，内容大部分属于时事政策类，开本极小，长约13厘米，宽约9厘米，刚好可以装在口袋中，非常方便随身携带阅读。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党员干部大都一边随军作战，一边进行时事政策和理论学习，口袋书的设计轻巧灵便，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这些口袋书大多是边缘未经裁切的毛装本，手写印刷，纸张粗糙，甚至没有像样的封面，让人透过外观就可以感受到当时艰苦恶劣的出版环境。

这批口袋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省委党校第二任校长——朱瑞的著作单行本，共有两册，其中一册为《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际斗争的一致》，开本均长13.6厘米，宽9.3厘米，未署出版时间，毛装，手写印刷，内封上钤有“渤海图书馆记”红色梭形印章，是当时中共渤海区党员干部的重要学习资料。

精选素材，挖掘红色文献英雄故事

2021年1月，图书和文化馆开

始结合自身馆藏特色，对存量丰富的山东地域红色文献进行深入挖掘，围绕“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沂蒙精神”这一主题，层层遴选出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沂蒙精神内涵的红色图书100种，积极筹备编印《馆藏沂蒙精神红色文献丛编》，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该丛编拟从5个方面进行选材，分别编为《人物篇》《事件篇》《党建篇》《政策篇》《艺术篇》五大类。其中《人物篇》从传承红色英雄故事的角度进行选材，最能代表沂蒙精神“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内涵特质。

保国安民、崇尚英雄是齐鲁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沂蒙精神的深厚文化底蕴。山东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不管是大小规模的前线战斗，还是日夜不息的后方支援，山东人民都倾其所有、全力以赴，给予最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从妇女英雄到儿童英雄，从战斗英雄到劳动英雄、民兵英雄、教育英雄，涵盖了各个层面的英雄形象。在《人物篇》的选取中，我们遵循“点面结合，分层展示”的遴选原则，在展示英雄群像层面，选取了《烈士传》《不朽的丰碑》《英雄小好汉》《人民英雄榜》等近10种；在展示个人英雄层面，选取了《我们的连长何万祥》《曹文选》《张富贵精耕细作》《教育英雄张健华》《温典祥班和张绪友排》等近10种。这些出版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文献，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真实记录了山东人民军民团结、共同抗战的感人故事，是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红色文化宝库，对于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文献中的部分藏书章

精品展柜中的部分口袋书

《馆藏沂蒙精神红色文献丛编》备选图书

“德主刑辅，以德化人”是中国古代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关于国家治理的德治主张，这种主张不仅体现了传统德治思想的根本特质，也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初步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最为剧烈的殷周之际”。见证了殷周兴替的重大历史变迁，奠定了宗周礼乐文明基础的周公，在总结历史经验之上明确提出“明德慎罚”，并将其作为周人治理国家的思想纲领，如《尚书·康诰》中的“克明德慎罚”、《尚书·多方》中的“罔不明德慎罚”等，长久地影响了中国人“治国平天下”的观念，铸就了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底色。

明德，意思是彰明德性；慎罚，指的是慎用刑罚，两者有先后主次之分，德为先，为主；罚为后，为次，德罚合治，缺一不可，必须共同施行。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传统的儒家思想还进一步强调，明德不仅要心存敬畏，认识到德的崇高地位而敬德，更要朝乾夕惕，日新不已地修德，这两个方面



□ 汤月娥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可分割。只有把德先立起来，按照德的要求行事，才能在治理国家中以上率下，化民成俗，导民向善。罚，作为“刑”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在百姓“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的情况下才不得已为之的，并且只有在“德”的统率之下作为一种辅助的惩戒，谨慎为之，才能发挥其“远邪轻难”的价值和作用。

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思想将德与刑结合起来，已经兼具国家制度和道德修养两个层面的内涵和主张，

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制度安排，也体现出一种主观上的德性规范。此后，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子提出“以德服人”、荀子提出“德刑并重”以及董仲舒提出“大德小刑”等，这些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德”与“刑”的认识和论证，日益形成了儒家“德主刑辅、以德为先”的治国思想。无论是“教化为先”还是“宽猛相济”等说法，都是这种思想的不同体现，在长久以来的传统国家治理实践中被始终坚持。中国古代历史的实践证明，能够较好推行这种思想的历史

阶段，往往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状况，反之，就造成社会失序、百姓不安的局面。要想了解“德主刑辅，以德化人”德治主张的丰富内涵，还需深入了解孕育这种思想的土壤及历史背景。具体而言，“德主刑辅，以德化人”德治主张的产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德与刑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与百姓相关，不能简单而论。《尚书·多士》中说，“唯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德的现实表征体现在民心民意之上，所以，重视

和强调“德”，就是要顺随民情，如《道德经》所说“以百姓心为心”。只有真正认识到德与刑背后所关涉的天地人一体的关系，才能系统地体察到“德主刑辅，以德化人”德治主张的深刻内涵，而非仅仅视其作为一种治理手段。

此外，在周公提出“明德慎罚”之后，“德法相济”“礼法并用”等主张也被相继提出。德与刑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等同于礼与法的关系，“德主刑辅”也被表达为先礼后刑，甚至有时候德礼、刑罚并用。如《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所言，“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要先德礼而后刑罚的意思。再如《唐律疏议》中也明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其意与“德主刑辅、以德化人”德治主张并无二致，都强调在二者施用时要先清先后主次，不能本末颠倒。

儒家经典《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德与刑，或者说礼与法之间是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的关系。严格地讲，德是本，要以德为先；刑为末，以刑为辅。唯有如此，才能“以德教民，以礼齐之”，使上下和谐相安，从而避免“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的局面，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后世思考和传承。

